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民族史译文集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

一九七八年

译者前言

本书是沙俄军事间谍 П. К. 柯兹洛夫自我国甘肃北部黑城盗走大批西夏文献的部份目录。这批文献现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

西夏是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公元1038—1227年）我国西部以党项羌为主包括汉族、藏族、回鹘等兄弟民族共同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地域包括现今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陕北、甘肃大部、青海东北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份。黑城（蒙语：哈拉浩特）系西夏故城，西夏时于此立威福军，为一军事要地。元置亦集乃路，立总管府。明代以后，该城渐废。

从二十世纪初，黑城遗址已为帝国主义的“探险队”所觊觎。沙俄上校，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兹洛夫从沙俄“探险家”波塔宁和奥希普切夫那里探听到黑城遗址的消息后，就十分垂涎于黑城的“秘密宝藏”。此人曾于1884年至1926年的四十多年间，先后六次窜至我国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西藏、四川等地，以游历、探险、考古为名，搜集和掠夺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文献文物。1907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以柯兹洛夫为队长，组织所谓蒙古四川探险队，于1908年至1909年两度至黑城，大肆搜索探掘。他们在该城遗址的一古塔中获得大批西夏文书籍，古物等，即运往沙俄的彼得堡。这次对我国黑城西夏文献的盗掠活动，是柯兹洛夫强盗生涯中较重要的一次。这些文

献已编目的达八千号（登录号）以上，已考定并收入本书目者近三千号（登录号），占藏件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

新沙皇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半个多世纪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文人们对柯兹洛夫及其同伙的这一强盗行径倍加赞颂。1963年，苏修科学院为纪念柯兹洛夫诞生一百周年，专门出版了他的《在中亚细亚的俄罗斯旅行家》一书。书中记述了柯兹洛夫的黑城盗窃活动，为其树碑立传，无耻吹捧。他们目恃攫有这一批西夏文献资料，公然宣称什么：“在研究唐古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工作中，苏联的学者负有特殊的责任”。从1963年本书目编辑出版起，到目前为止，苏联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西夏历史语文等方面的专著、论文，并在有关场合大肆吹嘘他们所建立的“新的科学领域——唐古特学”的“成就”。

苏修叛徒集团御用文人们的“唐古特学”的“特殊的责任”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说穿了，就是在苏修统治集团的指挥下，利用历史科学阵地为其领土扩张的政治目的服务。他们在其专著和文章中，一面“论证”西夏文化“源于中亚”；另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强调西夏的文化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独特文化”。而中国对“唐古特国家”只是“邻国”的影响。这一套谬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前者不过是重弹老殖民主义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老调，以便为侵略我国的西北地区制造“历史”根据；后者则是宣扬“历史民族区”的“文化主权”论，来否定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否定汉族文化和西夏文化十分密切的联系，及汉族文化对西夏文化的重大影响。他们从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西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所谓“研究”的同时，还攻击我国学者对西夏历史的研究，如果“仅仅是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的话，就是

什么“偏见”，就是“具有民族主义的基础的”等等。

众所周知，和其他民族共同建立过西夏地方政权的党项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同生息繁衍在祖国这一广大地区的其他兄弟民族，各有其自己历史发展的过程，各民族之间又有亲密的交往和相互影响，且都为缔造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创造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国黑城的这一批西夏时代的珍贵文献，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事实。

我们应该充分地利用我国这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献资料；充分地掌握和利用当前我国不断发现的西夏文献、文物以及其它西夏史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真整理和研究西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同时给苏修御用文人们篡改和伪造西夏历史的卑劣行径以有力的回击。

本书目西夏原文的译录错误很多，译者未见原件，不便遽改，故仍照录。望西夏文史研究者参订使用。

译者

一九七八年一月

目 录

- 西夏文写本和刊本.....З. И. 戈尔芭切娃 (1)
E. И. 克恰诺夫
- 西夏文字典《文海》和《文海杂类》及其在西夏
辞书中的地位E. И. 克恰诺夫 (114)
- 国外研究西夏文、西夏史简况史金波、白 滨 (124)

目 次

序 言

导 论

缩写名称

世俗著作解说目录

- | | |
|------------|--------|
| 一、汉籍西夏文译本 | 1—12号 |
| 二、字典和语音表 | 13—14号 |
| 三、西夏文学原著 | 25—39号 |
| 四、历书、图表、图样 | 40—46号 |
| 五、咒文、医书 | 47—54号 |
| 六、西夏法律文献 | 55—60号 |

佛经目录

西夏原文世俗著作和佛经目录

西夏原文目录名称索引

汉文目录名称索引

序 言

科学院亚洲博物馆过去所藏的写本和书籍资料，内有大量西夏刊本和写本，经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聂历山（Н.А.Невский）报导和刊布，早已为世界科学界所闻。这批刊本和写本是1909年И.К.柯兹洛夫在哈拉浩特发掘所发现的。自193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成立后起，那批西夏文献连同亚洲博物馆其它藏品便移交东方学研究所。1960年该所改称亚洲民族研究所。现在西夏文献就存在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

收藏这样大量的西夏文献，理当早就进行分析和整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遇到了一些难关，即这种文献所用的文字——西夏象形文字，那时还没有解读。因此，整理西夏文献的工作，一开始就是同西夏文献目录的文字解读工作一同进行的。

西夏学在这一阶段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聂历山，他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了六千左右西夏字。这对我们确定西夏文献的内容提供了很大方便。聂历山亲自完成的西夏文献识别工作就是证明。

1960年出版的西夏学著作包括一部《西夏文字典》，聂历山的解读都发表在这部字典中（1）。这是为我们重新组织人力进行西夏文献编目而创造基本条件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发表我们收藏的西夏文献中至今已经考定的文献目录并署明谁是考订者。这样，凡是听说我们收藏西夏文献的人便有可能了解其内容。

现在发表的暂且还是全部西夏文献藏件的一部分。但是即便这一部分也可使西夏学家看出其中有许多极有价值的、有些甚至是意想不到的资料，这些资料对西夏学的任何方面来说都是重要的。因此，本书的出版定将推动西夏学作为东方学一门真正的新学科的发展。

图·康拉德

导 论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登录工作，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中断，现在已经完成。这使我们第一次有可能把已经考定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提供给学术界。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的西夏特藏，就其数量和内容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弄到这些藏品是同著名俄国旅行家П.К.柯兹洛夫的名字分不开的。

柯兹洛夫是H.M.普尔热瓦斯基的助手和战友。在二十世纪之初，他就多次听到别的俄国旅行家如П.И.波塔宁和B.A.奥布鲁切夫谈起南戈壁沙漠湮埋的故城哈拉浩特。寻找哈拉浩特、揭开这个沙漠故城许多世纪以来的秘密，便成为柯兹洛夫及其战友的热望。柯兹洛夫在事隔多年以后写道：“对哈拉浩特的想念，完全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和想像……我们是多么幻想着哈拉浩特和它那秘密宝藏啊！”（1）

1908年3月柯兹洛夫的探察队找到了哈拉浩特，并且首次进行了研究。此后在1909年5月，柯兹洛夫探访西藏东部之后又重返哈拉浩特，专门对这座神秘的故城进行了广泛的发掘，寻找他所曾幻想的“神秘宝藏”。就在1909年夏初，柯兹洛夫终于在哈拉浩特城郊掘开一座著名的古塔，这座古塔“送给探察队大量宝物，是一座拥有各种书籍、文卷和抄本的完整书库”（2）。古塔下部还发现许多泥塑像，都“面向塔内，像喇嘛拜佛一样，前面堆叠有数以百计

的西夏文写经” (4)。

大量的西夏文写本和刻本，就是这样在五十多年以前发现的。

1909年秋，这些珍品运到彼得堡，后来在1910年便被分成两份。出土文物交给了俄罗斯博物馆（现藏国立爱密塔什博物馆），文字资料则被送交科学院亚洲博物馆，1930年该馆改为东方学研究所，1960年又改为亚洲民族研究所。那些文献就在这里按语种（西夏语、汉语、回鹘语、蒙古语、叙利亚和突厥语）分类，并经东方学有关专家进行研究。

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登录是同西夏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工作紧密联系的。此外还由于许多其它情况，整理西夏文献的工作并未系统地进行了，因此长期未能完成。

还在1909年即当这些文献运抵彼得堡送往地理学会之后，彼得堡大学的副教授 A. И. 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西夏文写本和刊本。他从中发现一部西夏—汉文字典，同年就在《帝俄科学院院报》撰文介绍 (5)。

这批西夏文写本和刊本送到亚洲博物馆以后，又曾按装潢尺寸分类，并且大部份加盖了亚洲博物馆的印章，根据纯形式特征（刊本大小和装订方法）进行了编号。但是不知当时是否曾开列清册。继续研究这些文献的是伊凤阁，他依据西夏—汉文字典和国外学者（莫里斯、德维利亚、布谢尔）的著作，首次确定了许多西夏文佛教和世俗文献。1916年，伊凤阁发表了西夏文《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6) 片断，附汉字西夏字对译。那些西夏字都是西夏经文与原本汉文经相对照确定出来的。首次发现和报导几种西夏详解字典 (7) 的也是伊凤阁。他的报导后面附有他所考定的佛经目录。除上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之外（本目录 №338）还有：

《大宝积经》（本目录№380）、《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本目录№131）的部分篇章，以及《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品中关于修行和祈祷的章节（本目录№312）（8）。

由于伊凤阁的努力，我们所藏西夏文字典和部分写本才为国外学者所知。伊凤阁本人也着手编写《西夏文字典》，这部字典在1918年即“已接近完成”（9），遗憾的是没有保存下来。

伊凤阁的著作，再加上他同国外学者（首先是中国学者）的广泛学术联系，推动了许多国家对西夏语文进行研究。

到20年代之初，经过卜士社、博唯利亚、莫里斯、罗福成、耶瑟尔、伊凤阁、本哈第夫人、查哈和劳弗尔等人的努力，西夏语文的研究已经积累和掌握了大量资料。乃是后来在译释或确定语文系属方面进一步发展西夏学的基础。西夏学的研究初期是同爱历山、王静如、罗福蕤和石滨纯太郎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爱历山、石滨纯太郎、王静如和罗福蕤是通过伊凤阁才知道我们收藏的许多文献。在二十年代之末，对西夏学发生兴趣的则是著名苏联汉学家龙果夫。

1926年发表了阿列克赛耶夫（当时他是亚洲博物馆远东特设的研究员，1929年起成为科学院院士）首次对馆藏西夏藏品作了概括性介绍。他说：“中国所谓西夏（1032—1227）的古西夏文书籍数以千百计，这种文字还未能完全读通，其文献具有特殊的、世界的意义。此种文字写本和刊本乃柯兹洛夫探察队所获，其中绝大部分为佛经，但其它题材似亦有之”（10）。

当然，这样介绍那些文献也是不够的。因此在1923年，柯兹洛夫专门告诉学术界：（西夏文）“书籍、抄本和佛像尚无详目”（11）。在二十年代之末，进一步研究西夏文献的则是龙果夫和爱历山。

在1929年，龙果夫发表了：《西夏—汉文字典中汉字音译西夏双音节词》一文⁽¹²⁾。

龙果夫研究这批西夏文献的工作总结，就是编出一套包括四十一项的文献目录⁽¹³⁾，发表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

如前所述，聂历山对西夏学发生兴趣是在二十年代之初。当时他在日本，通过忙于外交公务无暇从事学术研究的伊凤阁，以及鄂登堡院士，阿列克赛耶夫院士等人，掌握了西夏文材料，并且在日本期刊就此发表许多论著⁽¹⁴⁾。聂历山的著作立刻引起各国专家注意，从而使他跃居西夏问题研究者的前列。

1929年，聂历山返回祖国。是他第一个对亚洲博物馆收藏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开始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整理和研究，也是他第一个受命编造馆藏西夏文献清册。1931年他所编成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就发表在1932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著录共四十一种，其中有些与龙果夫的目录重复⁽¹⁵⁾。

聂历山一面整理文献和编目，一面努力探讨文献内容，进行文献的拼合。

聂历山文档有大量抄录，有的甚至是西夏文原著和译著整行整段的摘录，其中有些他已释读出来，有些他曾准备要译出来。他阅读佛经和世俗性著作的西夏译文时，随时补充了词汇，每次都对完全读通难懂的西夏文文献作出了新的贡献。聂历山精通东方语言，学识渊博，具有非凡的工作能力，这使他不仅成为西夏语文方面无与伦比的专家，而且为进一步研究西夏文献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后来从事西夏文献整理和编目的工作者，都是依靠聂历山的丰富遗产。遗憾的是，他自己很多计划都未能付诸实现。例如，他曾

拟订过刊布哈拉浩特西夏文献的计划。他在自己的计划中写道：

“刊布柯兹洛夫所获文献，乃是具有头等国际意义的科学事业。哈拉浩特出土的材料，至今几乎尚未能提供学术界使用。被英印旅行家斯坦因从哈拉浩特取走的文物，同苏联科学院和爱密塔什博物馆拥有的藏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16)。聂历山还在自己的计划中着重指出：我们的藏品在数量的丰富或内容的多样性方面都是举世无双的 (17)。在《西夏学历史概述》和《西夏文字及其文献》两文中，聂历山对我们收藏的西夏文献作了极好的介绍 (18)。他的文章和他编制的目录，有助于进一步完成他所开始的西夏文献整理和编目工作。

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后，聂历山已经不在人世。当年在三十年代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继续西夏学研究的龙果夫，这时又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工作。龙果夫去世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由研究所工作人员戈尔芭切娃接手，后来从1959年起才有克恰诺夫参加，这份目录就是他们两人共同编辑出版的。

由此可见，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编目工作时断时续，由上述诸家先后进行了将近五十年，直到现在才告结束。我们的西夏文特藏，毫无疑问是有很大学术价值的。这份目录将有助于了解我们西夏文特藏的内容。

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全部西夏文献，总计8000多号。其中现已考定属于世俗性的著作约60种，佛经约370种。

已经完成的文献整理编目工作参加者列举如下：

聂历山——登录号：1至955；

龙果夫——登录号：956至3675（计2720件）；

戈尔芭切娃——登录号：3676至3848（计173件）；

克恰诺夫——登录号：3849至8090（计4242件）。

上列8090件，已经考定者近3000件，约占全部藏件总数百分之三十八。

本目录所收已经考定的文献项目，每项都附有一个登录号，或列举几个登录号，后者表示某项文献或某项文献的某些部分属不同版本。因此不难确定，某一文献或某一文献的某一部份是由谁发现和登录的。

除伊凤阁认出的那些文献以外，大多数考订工作都是聂历山最先完成的。

譬如，本目录所收六十种世俗文献，聂历山考定者为三十种，其余三十种有八种是龙果夫考定的，有二十二种是克恰诺夫考定的。

因为这项整理工作是经过很长时间完成的，而且先后参加工作者完全没有联系。所以有些文献或其部份的考定发生重复。我们在准备这份目录时，曾再次核对全部藏件，又认出许多从前已经登录，但是没有辨认出来的许多文献项目，并对过去已经考定的项目，也作了一些更正。在编制本目录时我们要再次强调指出，聂历山早先完成的工作是起决定作用的，因为只有掌握他的遗产，后来的整理工作才取得了现在介绍给读者的这些成果。

下面就来简单介绍藏品所属的年代：最早试图确定哈拉浩特全部出土文献的年代者是B.科特维奇。他研究了柯兹洛夫在哈拉浩特发现的元钞，藉以确定这座古城存在的最晚年代。他得出结论说：“此城于1287——1368年间犹存”⁽¹⁹⁾ B.H.卡津则指出：哈拉浩特文献的最早年代，可能是十一世纪⁽²⁰⁾。

众所周知，元代曾多次刊印西夏文佛经⁽²¹⁾。因此可以设想，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西夏文献，有一部分属于蒙元时期，我们还有一些西夏文献则是西夏亡国以后的。但是所有年代确切的写本和刊本，都不超过十三世纪前25年。那些注明年代的文献当中年代最早的是“大安”十一年*，即公元1085年（见登录号4773），年代最晚的则是公元1223年至1227年⁽²²⁾。因此，科特维奇所说的哈拉浩特全部出土文献（包括蒙元时代者）的最晚年代，并不适用于我们所藏西夏抄本和刊本，因为其中有些文献的年代，只注明十一世纪后25年到十三世纪前25年。卡津推测哈拉浩特城可能在十一世纪就有，我们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藏品倒是完全证实这一点。还要补充指出的是，有一份反映十一世纪中期西夏疆界状况的汉文西夏地图，便以哈拉浩特作为重要的军事政治中心⁽²³⁾。

由此可见我们的全部藏品可以断为公元十一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之物。柯兹洛夫从中发现西夏文献的那座古塔，被封闭的年代可能是在西夏存在的末年；也可能是在公元1226年蒙古攻陷该城的前夕⁽²⁴⁾。

西夏刊本的装订，是仿照当时的汉文书籍装订式样⁽²⁵⁾。大多数世俗内容的书籍都是《蝴蝶装》。多数佛经则是经卷或《折叠装》。很多西夏文佛经的装璜就像几百年来藏文古版经籍那样（即所谓《梵夹装》，那是西藏人从印度传入的）。

西夏人使用的纸张，质量有好几种：从厚而坚密的、光滑的纸和胶合纸，到薄而透明的、像现代“烟卷纸”一样的纸都有。纸张的颜色多是灰色而深浅程度不等，从雾白色到近乎褐色者都有。也

* 原文误作“道安”十一年——译者。

有少量纸张是涂鲜黄色。西夏人写字用黑墨。通常篇幅最大和最常用的经典，是写在最好的光面纸上，这种纸的坚固耐用并不亚于现代的纸张。木版印刷的世俗文献如法典之类，则用中等质量的浅灰色软厚纸。

这本现已考定的写本和刊本文献目录，包括世俗文献和佛经文献。两者的数量很不均等，佛经占绝大多数（百分之八十以上）。本目录的每部分逐项标出连续编号，可以看出已经考定的文献总共有多少。每项条目另附登录号，表明我们所藏的件数。

同样的文献可能有不同的登录号，那是因为这些文献分散在别的写本和刊本之中；后来在整理登录的过程中才陆续发现，故此编号不同，甚至往往是经过不同人手。本目录所反映的文献分散情况，仅限于世俗文献。这样可以看出哪是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哪是相同的版本。鉴于世俗文献有很大价值，我们均一一略加说明，介绍其外形特征，如页面和文面大小，张数和页数（指《蝴蝶装》页数），每页行数和每行字数，作品篇章，成书或刊印年月，作、译者和抄写人姓名等（如果原书有此）。凡论伊风润、戴历山和龙果夫早年所写的内容简介，我们都原封不动，保持他们记录的原样。

有些世俗文献没有名称，内容尚未确定，本书未予著录。例如有数十件文书写的是草体字。我们暂时还看不懂。还有二种可能是世俗文献（历史著作），我们也没有收录，即：第5875号《太祖继迁文》（西夏开国者李继迁〔政〕事）残叶；第7579号《贞观记》

（西夏贞观年间〔公元1102—1114年〕记事）——这是一本小书；第4189号，写本残叶，首尾俱缺，很可能是天盛年间（公元1149—1170年）某种大事记。

佛经文献的西夏原文我们另列总表，均附以汉文名称，部份附

以梵文名称。对于这些佛经还需要进行长期大量的工作，把分散的部份加以拼合，确定哪些是相同的版本，并把同一部经的各部份统一起来，然后才能像现在介绍世俗文献那样加以说明。

考订佛经著作所利用书目、参考书和字典如下：

1. 《南条目录》(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s) 南条文雄 (Bunjiu Nanjio) 编，1883年。

2. 《法宝义林》(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du Buddhisme d'apres les sources Chinoise et japonaises), 戴密微 (P. Demieville) 主编，东京，1931年。

3. 《西藏大藏经总目录》(The Complete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Hakuju Ui, Munetada Suzuki, yen sho kanakura, Tokan Tada等编，1934年 (26)。

大家知道，西夏也出版汉文书籍。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文献，有些著作除西夏文印本外，也有汉文印本。这在本目录即标：“Кит. X. X”字样，意即“有汉文本，哈拉浩特所出” (27)。

我们的西夏特藏还有62%未能考定，其中绝大多数是多种佛经片断。只有精心阅读找出据以译成西夏文的原著，才有可能确定其内容。

我们没有把我们所藏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同国外所藏进行比较。其它拥有较大量西夏文特藏的国家（中国和日本）情况，请见下列两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28)（中国收藏情况）；和西田龙雄编《天理图书馆藏西夏文献》（日本收藏情况）(29)。

下面简介本《目录》的编排和使用方法。